



## 这就是中国 ——《中国妇女》再版序言

[法]克里斯特娃 (Julia Kristeva) / 文  
张群 / 译

1974年，我的人生终于安定下来：获得了中文学士学位，手上和脑海中收藏了大量的表意文字，遭遇了一段复杂的情感，对中华文明有了一份越来越严肃的热情，我准备成为一名汉学家。其他的逻辑又让我做出另外的决定，比如，这次中国之行使我对自已开始汉学研究的能力产生困惑和怀疑，或者进一步说，甚至对真实介绍中国世界这一可能性产生怀疑；这种介绍可能就是一份博学的工作（一份多么值得称赞又多么艰难的工作啊），或是以我们西方的标准对他们的事实进行评判，而使这项工作成了我们评判标准的一个美丽投影（最简单的投影方式就是殖民主义倾向，这种倾向在这一领域比在其他“东方主义研究”领域更易于形成）。

在1974年5月1日的节日氛围中，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之后，我们是第一批应邀到中国访学的知识分子代表团之一。这个被称作“原样派”的代表团由菲利普·索莱尔斯、罗兰·巴特、马尔瑟林·普雷内、弗朗索瓦·瓦尔和我组成（雅克·拉康可能出去旅行了，最后没能和我们汇合），在我们的行程中，都有一张巨幅大字报先于我们到达目的地，通知那些惊讶的人们，上面写着我们迷一般的名字，但这些名字能否引起他们无条件的热情倒是令人怀疑的。我们一路去了北京、洛阳、西安、广东、上海和一些不那么知名的小镇：我迷失在绣着盛开樱花的粉红色丝绸中，我练习着从道观和佛教寺庙的石碑中破解智慧，而兵马俑和长城则让我肃然起敬，惊叹不已，但我的主要观察目标是围在我身边的真实现代女性。因为，那一时期，纽约和巴黎兴起了女权运动，毛泽东本人在“红卫兵”浪潮后发动“妇女”浪潮，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。我身上带着一万法郎的合同金，那是新近创办的《妇女》杂志提供给我的，这笔钱足以支付我的路费，也让我得以把精力集中在这个热门的时代主题上……在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之间，人类的多样性更让我着迷。如果宇宙是用“阴”“阳”和表意文字来表示的话，那么，这种多样性促使我去发现权力，尤其是“社会主义”权力在这个地球上可能

拥有的另一面貌。

这是一个奇特的时代，一个巧合的时代，总之是一个清晰的时代，在这个时代中，人们可以把政治看成是乌托邦式的，就是说那会冒一些个人的风险，要承担投射在中国幻影上的法国绝境的危险。何况源于“平民社会”的某些“网络”已经形成，这可能使得这种经历更像是无政府主义的行为。然而，我很快发现这些“网络”以及它们“绝对自由主义的”独立性完全是相对的：我和我的女编辑们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，她们通知我说要换掉我的“父姓”（多么恐怖的事情！），我是想在我的书的签名上冠以父姓，而不是“夫姓”（多么不合逻辑！），把它换成她们女主编的姓氏，我对女主编满怀尊敬和感激（这在团体逻辑中是理所当然的），后来因为我们在女性性别特征上各自观点的不合，我就想把我的书从她们的网络中退出来。但书已经在印刷了，得知这一消息时我吃惊不已。所以我不能再读手稿，也不能再读校样，我放弃了一切，从平民社会的“绝对自由主义网络”直到短暂的介入政治的一切。精神分析学、母亲的身份和写作将在此后给予我大量的东西来填满我的日日夜夜。

二十五年之后再写这篇文章，并不是说我必然要做一个总结：不管有无道理，我还没有下结论的心情；苦难教会我要活得坦荡。很多读者和朋友都要求再版（因为这本书的法文原版和英译版都已经买不到了：英译版名为《About Chinese Women》，New York, Urizen Books, 1977, Londres, Marion Boyars, 1977），我也希望能实现这次再版，因为在重读这些文字时，我又找到了一丝属于我的痕迹，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退：那是在他者面前、在阅读面前、在相遇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惊奇。越过大家看见的主观利益过分关注的主题（比如母性、家庭、两性之间的关系，等等），我希望读者也能在其中观察到一些思索轨迹，这在我看来远远胜过我的个人经历，也胜过我们“68年这一代人”的经历。

我当时总是吃惊于某些人的攻击，他们指责这个时代年轻的毛泽东主义者，要这些年轻人把最不负责任的极权制具体化，那个时候这种行为还不是最残酷的犯罪行为。我没能认识这种“毛泽东主义者”。大家在这儿读到的“一些中国女性”就代表着对社会条约基础的一个质疑，比如它是由性别不同以及它在历代文明中的不同调节所构成的，它从深层次上限制了伦理学，限制了信仰、宗教和家庭权力的不同形式，最终甚至限制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表现形式。当避孕药和自愿流产在法国还不被允许的时候，当流行时尚还不属于女部长们的时候，中国，这个好像从中世纪觉醒、跳出斯大林主义的国家，呈现了一幅由问题和回答构成的镶嵌画，这些问题和回答只能促进对“第二性”的将来的思考，不，是对“半边天”的思考。这种或然判断总是处于时代前沿。首先，因为我们国家女性问题的实际前沿，虽然已经到了制定男女平等法律这一地步，但并没有深入到触及两性之间的关系问题：如果去听听精神分析学上醒悟了的智慧的话，人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基本上很困难，而人们也就想让它保持这种难度，但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难以调解。其次，现今的中国朝着市场经济方向的发展，也正依据西方的老模式在解放中国女性，而人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些进步是如何与传统相协调

